

观察

◇本特约通讯员 章明(Adetoro Olaniji Banwo)

中国发展为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新机遇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十五五”时期擘画了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福祉的新蓝图。对非洲而言,两会释放的政策信号蕴含着携手共进、逐梦现代化的宝贵机遇,在非州农业绿色现代化领域体现得尤为充分。

当前,中国正着力推动发展模式深刻转型,将前沿科技与产业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未来能源”,并对“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作出系统部署,同时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等领域,以此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整体生产效率。两会同样高度聚焦民生关切,“十五五”时期中国将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文旅、就业、消费等领域的发展,使发展转型成果切实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这一宏观转型的牵引下,科技赋能正精准落位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方向,智慧农业成为主攻领域之一。通过数据驱动提升产量、减少损耗,综合运用无人机、传感器、卫星影像、灌溉自动化、作物监测及精准施肥等技术手段,实现农业生产与农业现代化。这一以自动化、数字集成、数据分析为特征的人工智能农业模式,根本目的在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对于同样面临农业农村转型压力的非洲而言,中国的这一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当前,非洲各国农业部门正面临气候变暖、生产力不足与收成不佳等多重挑战。许多地区长期依赖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化需求之间的张力,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短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使乡村面临发展滞后与生计困难的困境。若能将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经验与先进技术有效嫁接,将助力非洲当地农民获取精准气象信息、建设智能灌溉系统,接入数字查询平台并获得科学指导。农业价值链也将随之提升,推动减少损耗、发展农产品加工、构建冷链物流体系,带动加工、物流、电商等关联产业在乡村落地生根。由此带来的就业岗位与收入渠道将有助于缓解非洲农村人口外流压力,逐步改善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城乡关系走向良性互动。

面对非洲农业转型的现实挑战,中国“十五五”规划所展现的发展理念与实践路径为双方深度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非洲若要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获益,需加快自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能力建设,鼓励符合政策发展路径的创新实践。总体而言,“两会”所勾勒的是中国全方位推进的技术红利,可持续、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非洲各国唯有深化对华全面合作,方能更好从中受益,加快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作者系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语言学、非洲与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刘雨薇翻译)

新书 | NEW BOOK

《古罗马的赞助人：梅塞纳斯的生平与来世》

◇艾米丽·高尔斯/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于4月21日出版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拉丁语文学教授艾米丽·高尔斯(Emily Gowers)的新书《古罗马的赞助人:梅塞纳斯的生平与来世》(Rome's Patron: The Lives and Afterlives of Maecenas)。该书介绍了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谋臣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的生平,以及他在古罗马诗歌和古文化的演变及其持续影响中所起的作用。

梅塞纳斯是古罗马最知名且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他曾当过政治领袖,但掌握非凡的权力;他是艺术家的赞助人,爱好奢华,也是奥古斯都的朋友。然而,他留下的痕迹稀少且难以考证。高尔斯在这部著作中没有尝试传统人物传记的写作方式,而是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她讲述了梅塞纳斯的影响力、不断变化的身份以及两千余年来围绕他形成的种种传说。

高尔斯分析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在梅塞纳斯的支持和影响下问世的重要诗篇,如维吉尔的《牧歌》、贺拉斯的《颂歌集》和普鲁塔克斯的《庞贝城》,以及梅塞纳斯的诗歌在这些文本中的形象。高尔斯指出,梅塞纳斯一直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存在于那些与梅塞纳斯有着微弱联系的花园、建筑和物品周围的幻想中;它存在于从卢多维奇·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本·约翰逊(Ben Jonson)到菲利普·惠特利(Phillip Wheatley)、叶芝(W. B. Yeats)等作家的作品中,也存在于慈善事业之中。

(陈禹同/编译)

秘鲁学者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让世界称道

◇本报记者 刘雨薇

2025年夏天,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前秘鲁教育部长尼古拉斯·林奇(Nicolas Javier Lynch Gamero)漫步在上海外滩。摩天楼群与艺术风格装饰的摩天建筑在他眼前交错生长,构成独特的城市天际线,这幅景象恰似他充满张力的学术人生。20世纪70年代,他在学校求学时便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近半个世纪后,他终于踏上这片土地,从上海、南京到西安、延安,展开实地探访。

在西方自由民主范式深陷危机之际,中国为何能坚定文化自信并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究竟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些问题贯穿了他的整个行程。林奇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他在中国看到的不仅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更是一种在五千年文明交流与百年抗争中生长出来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范式的替代性现代化可能。这份带着历史纵深与人文温度的观察,凝结着他拉美国家走出发展泥潭的殷切希望。

追问现代化“元问题”的中国答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初希望了解中国是基于何种原因?此次中国之行是否验证或改变了您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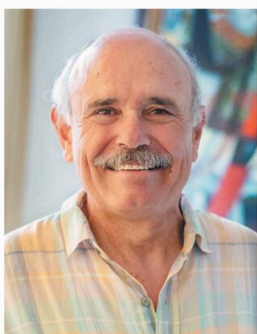
林奇:2025年夏天,我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学术访问与实地观察。短短一个月,我一直在追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最终,我在一个清晰的印象中找到了答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创新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过程,恰恰体现了追求和平发展、民族自信与变革勇气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

20世纪70年代我就读于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那时我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真正让我思考走向成熟的,是这次亲身观察。我目睹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迁,也切身感受到这种变迁与我早年来求学时对中国想象之间所形成的差异——这里既有翻天覆地的变革,也有清晰可辨的延续。

促使我成行的还有几重现实关切。第一重关切来自思想界:西方左翼,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识分子,究竟如何看待改革带来的中国转向?中国正在建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第二重关切来自国际格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持续上升,这个国家近年来已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日常焦点,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第三重关切,也是最深层次的关切,关乎民主与民生议题。当人们目睹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看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陷入危机甚至导致一些国家濒临破产的困境时,人们自然有理由去探讨西方政治传统的框架,去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在都市烟火与历史深处读懂千年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亲自去过上海、南京等城市后,您认为哪些具体现象或细节最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成果?



■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尼古拉斯·林奇(Nicolas Javier Lynch Gamero) 受访者/供图

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成果?

林奇:我对中国式现代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城市蓬勃生长,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这些景象集中展现了中国在物质成就、社会凝聚力与历史记忆传承方面的成果。我以走访的上海为例,这座拥有两千四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居民聚居的历史虽然久远,但作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却始于19世纪下半叶。如今的上海是中国经济繁荣的鲜明代表。这种繁荣不仅体现在亮眼的数据上,更体现在城市的勃勃生机之中。这似乎是一座从不停止运转的城市。从城市风貌来看,乍一看摩天大楼上的天际线,人们或许以为高楼只集中在市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看似郊区的地方,也随处可见高楼林立。那里有成百上千栋高层建筑,围绕购物中心和餐饮服务设施排列。

相比之下,南京的城市格局与上海相似,只是人口规模小一些,不到一千万。那里同样是高楼鳞次栉比,成千上万的办公楼与住宅交错排列,立体交通的高架层叠叠,让人感觉这是一座“无限延伸”的城市,很难辨出传统意义上的“市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以前的记忆并未完全消失。在现代建筑的背后或旁侧,仍然可以看到其他时代各种风格的建筑。偶尔走进小巷,还能发现20世纪20年代曾构成上海城市中心风貌的“装饰艺术”风格遗迹,让人们隐约想起那座已然远去的城市。

从城市生活来看,这里的人流涌动既熟悉又新鲜,而且格外显得“年轻化”。最打动我的成是成群结队出行的家庭,祖父母、父母和子女或孙辈一起走在路上。单从穿着就能区分出不同世代:祖辈多穿着朴素,而年轻人则穿着时尚,年轻人尤其是女生在着装上与品牌上的投入,跟长辈们相比简直不是一个量级。这种消费模式在南京、北京等其他城市同样存在,只是在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家庭与青年成群结队走动的场景,让我对一位中国朋友曾提到的观点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中国文化中,家庭被视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代际之间的联系与支持非常

紧密,个人的发展往往也与家庭的福祉紧密相连。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历史如何帮助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

林奇:前面我提到,我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究竟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一个更为基础但又紧密相关的方面,那就是中国人民对历史与传统的巨大自豪感。这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所特有的自豪感。很多与我交谈的中国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领域,都这样告诉我,而我也在街头巷尾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为自己的历史感到骄傲。这意味着,许多深厚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例如,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拥有高度制度化的行政体制。这种长期的国家建构传统,无疑深刻影响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中国。

如果我们不追溯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遭受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就无法理解中国后来发生的一切。当时,西方列强的目标是把中国置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志之下。为此,他们施加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开放港口、割让租界,导致中国国家主权不断丧失,这引发了各阶层人民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救国之路的艰苦努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从未停止。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段历史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我参观了几处极具分量的博物馆,感受到古代历史与近代历史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其中之一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中国红墙是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多位曾访华的朋友都建议我一定要去参观这个展馆。展馆本身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大发展的一个例证。展览通过丰富的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从照片、影像资料,到领导人使用过的家具与物品,再到关键历史节点上重要领导人的真人大小雕像。整个展览按照时间脉络展开,以小见大,以近观史为背景,一直延伸到当下。

我还参观了一座极为震撼的纪念性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在短短几周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超过30万中国平民遇难。这座纪念馆于2014年被确立为国家公祭仪式的永久举办地。馆内通过摄影、录音、雕塑以及对旧城场景的复原等多种方式,真实展现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种种暴行。

此外,我还去了西安最负盛名的秦始皇陵,看到了兵马俑。成千上万真人大小的士兵雕像守卫着秦始皇的陵寝。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纷争的混乱局面。兵马俑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生动体现了当时中华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超越西方范式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来华,您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何新的认识?

林奇:这次来华,我最大的收获是亲眼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面貌。这种现代化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既追求效率,又注重公平;既保持开放,又坚持独立自主。这种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的发展成就,已经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充满活力的中国。

中所阐述的,评分系统随机地嵌入了有关负面行为的假设,再将假设当作基本事实传达给用户。

随着这些指标的普及,一种新的、基于数据的“好人”定义由此形成。其影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项决策中,例如,人们会遵循应用程序给出的育儿建议;选择有助于提升信用评分的贷款;带着手机去跑步以换取积分;活动能被计入健身目标数据库。真实的参与与追求数据指标优化之间的界限就这样变得模糊不清。

长期以来,哲学界一直在探讨人如何才能过上美好且有德行的生活。从古希腊才能,文章提到,随着传统意义上道德权威的式微,算法系统正在试图填补这种空白。尽管对算法的宣传往往直接宣称其能解答“灵魂之问”,但清晰的指标却表明用户是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从而提供一种安慰感。高分、绿色对勾、连续完成的记录,一个个细微而平常的信号,构成了

林奇:归根到底,促使我此次来中国并在旅途中始终萦绕在脑海的核心疑问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层面上,是否正在构建一种现代化发展的“替代性”道路?

而今天的现实,给出了明确的回答。1980年至2025年间,中国实现了平均约8.6%的经济增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一增长使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于2010年从“低收入国家”正式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正稳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也体现在人均预期寿命的提升上: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25年的79.25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斯所言,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增长是否转化为社会福利的最重要指标。

那么,这种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这条道路上重要的“经济引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它将发展生产力重新置于首要位置并以此作为改变生产关系的基础。这一转折带来了极高的再投资能力。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的高储蓄率长期维持在40%左右的高位。这种持续的高储蓄率,有力推动了人均寿命的提高和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与中方学者就民主议题的交流中,哪些观点最能给您带来启发?

林奇:刚抵华不久,我便收到了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与西班牙语系的邀请,作了一场题为“拉丁美洲民主化的困境”的演讲。那天,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讨论民主与民生议题并不容易,但却很有必要,也让我受益匪浅。

拉丁美洲的困境,恰恰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危机密切相关。这一视角为讨论打开了空间,使我得以在中国的语境下探讨了拉丁美洲的现实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起点。

过去一个世纪,“自由民主”几乎成为“民主”的代名词。如今,这一范式陷入危机,西式民主自然不能成为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标尺。此外,中国的发展成就巨大,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但是中国始终坚持与和平发展,从不追求霸权与扩张。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对西式民主的怀疑与批判是有正当理由的。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国家需要开辟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多次提到,或许某种“民主工程”能在拉美当前的阴云中开辟出一条新路,但前路如何尚不可知,让我们拭目以待。

(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教授程弢译并翻译)

动态

审慎对待算法的道德评判功能

本报综合报道 随着数字产业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图景发生深刻变化,这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反思。近日,美国波特兰大学营销学助理教授贝丝·迪福(Beth)在“对话网”刊发文章,从道德指标的概念出发,分析了算法权力行为方式与价值理念的重塑。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算法是否正在成为新的道德权威?

从应用程序到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家宣传的产品功能颇具吸引力;为使用者在健康、财务等方面的状况提供清晰的反馈。然而,在表面的客观、中立、数据驱动之外,当算法有权定义何为良好行为时,这指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转变——指标被转化为道德评判。迪福探讨了这些指标如何悄然改变人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他人的评价。

文章指出,如今人们开始从各种分散的信息来源中整合出自己的是非判断标准,并且这一过程越来越多地涉及商业逐利背景下的评分、排名和数据看板。健康类应用程序

序将运动、睡眠和心率数据转化为表现指标;工作平台用数据看板、排名和连续打卡记录代表任务完成情况;信用系统对司机、卖家、自由职业者等进行评分,并用一个数字来体现其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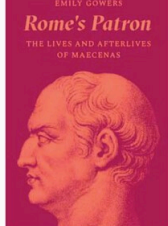
即便是人类最具情感厚度的角色之一——父母,也受到了这种逻辑的影响。可穿戴设备监测设备能够监测婴儿的呼吸情况、血氧水平、睡眠模式转化为图表、警示和反馈。近期研究发现,这类工具正催生新的角色期待。有专家表示,当自己忘记给孩子充电时会感到非常内疚,因为没有像“合格育儿方式”所推荐的那样密切关注孩子的身体状况。此时,监测设备已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一种对“负责任的父母”的验证。

文章写道,指标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相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作出的各种主观判断,精确的数字让人感到更加可靠。然而,正如美国历史学者杰瑞·穆勒(Jerry Muller)在《指标陷阱》(The Tyranny of Metrics)一书

中所阐述的,评分系统随机地嵌入了有关负面行为的假设,再将假设当作基本事实传达给用户。

随着这些指标的普及,一种新的、基于数据的“好人”定义由此形成。其影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项决策中,例如,人们会遵循应用程序给出的育儿建议;选择有助于提升信用评分的贷款;带着手机去跑步以换取积分;活动能被计入健身目标数据库。真实的参与与追求数据指标优化之间的界限就这样变得模糊不清。

长期以来,哲学界一直在探讨人如何才能过上美好且有德行的生活。从古希腊才能,文章提到,随着传统意义上道德权威的式微,算法系统正在试图填补这种空白。尽管对算法的宣传往往直接宣称其能解答“灵魂之问”,但清晰的指标却表明用户是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从而提供一种安慰感。高分、绿色对勾、连续完成的记录,一个个细微而平常的信号,构成了



Emily Gowers
Rome's Patron
THE LIVES AND AFTERLIVES OF MAECENAS

(王悠然/编译)